

“纪念我们自己的节日”—— “九一”记者节与民国报人群体职业形象的建构

齐辉

摘要

1933年中国报人群体确立每年9月1日为记者节。“九一”记者节，从民间报人自发庆祝到国民政府确认其为“国定记者节”，彰显了民国报人群体职业形象与地位的提升。借助“九一”记者节及其活动，依托“言论”与“仪式”，民国报人群体力图建构新的社会历史记忆，借以扭转自近代以来国人对新闻界的负面认识。本文认为，“九一”记者节是民国报人群体重塑职业形象和报界传统的自我尝试，同时亦昭示中国职业化报人群体的崛起。

关键词

“九一”记者节、报人群体、职业形象、新闻职业精神

作者简介

齐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新闻传播史。电邮：qihui78@163.com. 邮编：400044。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No：106112015CDJSK07XK17）的资助，系重庆大学科技创新专项项目“重庆抗战新闻传播史（1937-1945）”研究成果。

"In Memory of Our Own Festival" :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Journalists' Day on September 1st" and Professional Images of Journalist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Qi Hui

Abstract

In 1933, Chinese journalist groups had established The Journalists' Day on September 1st. The Journalists' Day originated from some spontaneous movements of our country's folk journalists. Finally, this festival was confirm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be the "National Journalists' Day", which improved the professional image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of journalist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ist group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ried to construct a new cultural tradition to reverse the negative perceptions on the press since modern times by the Journalists' Day and its celebrating events, related comments and ceremon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festival is not only a self-attempt to reestablish the professional image and occupational tradition, but also manifests that our country's journalist groups of professionalism rise suddenly.

Keywords

Journalists' Day on September 1st, journalist groups, professional images,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 spirits

“九一”记者节是民国时期中国报人群体的职业节日。它于1933年由杭州记者公会呼吁创设，1944年被国民政府正式确立为法定节日。在新闻界与官方的双重推动下，至1949年前该节日纪念活动前后延续近十五届，成为报人积极参与，民众认同度颇高的职业纪念日。

以往学界对于“九一”记者节的研究，多从其创办的政治动因入手，认为该节日是民国报人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压迫舆论”，“争取民主自由”¹的政治活动，却较少从“新闻本体”视角思考该节日在民国新闻职业化建设中所发挥的地位和作用。至今对于“九一”记者节的研究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中国新闻界如何度过这个“自己的节日”？他们如何借助节日的“言论”与“仪式”构建新闻业的职业“记忆”？在记者节中民国报人如何表达诉求？记者节对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发展产生过何种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学界尚语焉不详，莫衷一是。

本文认为，“九一”记者节并非单纯的行业节日，它是民国报人改良自身职业形象的努力。它的创设主题及活动即是民国新闻业态除旧布新的反映，也与时局和国运的变动紧密相关。笔者拟用史料，勾勒30—40年代报人在记者节的活动轨迹，力求揭示“九一”记者节与现代中国变局的互动关系，探讨其在民国报人职业形象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以期抛砖引玉，丰富学界对民国新闻业的认知。

一、从“我们”的节日到“国定记者节”：“九一”记者节的主题与活动

（一）“九一”记者节的初创与职业诉求的多样

1931年到1936年是记者节孕育和草创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

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由，颁布《出版法》等法律、强化新闻检查制度，实行新闻“党化”与“统制”，引发了新闻界的普遍不满。1933年1月，镇江《江生日报》经理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以“宣传共产”为名枪杀，激起了全国新闻界的强烈抗议。事发后，镇江、无锡、上海、南京等地记者公会纷纷召开大会，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凶手，“以保人权”。迫于舆论压力，1933年8月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对“新闻事业人员切实保护”。行政院“于当年的九月一日，令饬内部，同行各省市府遵照”。“此令颁布后引起全国新闻界莫大兴奋，杭州记者公会即向全国同业提议以是日为记者节”（大公报，1946年9月1日）²。1934年，青岛、长沙、厦门、重庆、北平等地记者公会组织随即开始记者节庆祝活动，“嗣后历年均有举行”，“九一”记者节由此创设。

初创时期的记者节，因未得到官方承认，其纪念活动多为报社自发组织活动，规模与影响较小。1934年首届纪念活动几乎未引起国人的关注。据《申报》记载：“那时的记者节并不十分热烈，全国新闻事业繁荣的几个城市，上海、南京、汉口、广州、香港都没有什么表示”，（申报，1946年9月1日）在厦门、长沙、青岛等地记者节的活动仅为休刊、放假和聚餐。唯有北平、太原两地报界团体的活动尚具规模。他们致电“中央”，敦促国民政府“实行去年九月一日命令，保障记者安全，维持言论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九一记者节的创设之初在国内虽反响平平，却在海外华侨报界中得到积极响应。在华人报刊发达的星洲、檳城等南洋地区，早在1935年就通过举办国际报纸展览、纪念会和酒会等活动来庆祝记者节，“中西报界集于一堂，有史以来所未有”（外部周刊，1935年9月10日）其活动规模和影响都超越了同时期的国内报界。

记者节成立初期，民国报人所表达的职业诉求颇为多样。在1936年《新闻杂志》出版的庆祝记者节《专号》中，曾汇集了当时《民国日报（江西）》、《苏报》、《东南日报》、《浙江商报》等东南地区报纸有关“九一”记者节的社论文章。通过分析其内容可见，这一时期记者节的言论主要涉及“报人道德”、“健全舆论”和“报人合作”。有报人提出，设立记者节有助于“严密的组织，肃清记者败类，整饬新闻阵线”，是“推进整个新闻事业的起点”。还有人提出，“记者节是我们同业本身的一个纪念日，我们应该认清纪念的意义，这不是狂欢一日的来临，我们要切实负起新闻记者的责任，务使与全社会发生极大极良的影响”。（新闻杂志，1936年9月1日）

总体而言,中国报人希望借助职业节日宣传和教化力量实现整肃报业,提振行风,重塑职业形象的目的。记者节初创时期,虽缺乏鲜明的活动主题,但节日设立的紧迫与必要,却已成为整个行业的普遍共识。

(二) 抗日救亡与“九一”记者节的正式确立

1937年到1944年,“九一”记者节随着抗战爆发,真正引发了全民关注,因其广泛的社会反响,最终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国定记者节”。抗战军兴,中国报人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皈依,投身于救亡运动中,记者节遂成为报界表达救亡诉求的载体。1939年《大公报》刊文表示,“今天是九一记者节,在民族大战中,我们的报人逢这个节日,实有一场的感奋与惭愧。报人所一向视若生命的是言论自由,但在今日这个问题,简直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现在我们奋全力拼生死争的是民族国家的自由……所以今天记者节我们第一应为尽力国家自由而感奋;第二为自己的尽力不够而惭愧”。(大公报,1939年9月1日a)记者如何救国?新闻界如何参与抗战?报人在抗战中的责任与使命,成为这一时期记者节的核心主题。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开始有意扶持甚至直接策划和参与记者节的庆祝活动,官方的介入提高了节日的规格,使其呈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

抗战时期国统区报界与国民党形成一种合作的默契,一方面抗战军兴,“报人的脉搏呼吸,无不与政府的政策同其节拍”。(大公报,1942年9月1日)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也开始对记者群体更加重视,此间军政大员频频列席记者节纪念集会,甚至逐渐成为记者节的惯例和常态。战时各地记者节庆祝活动中,以陪都重庆的纪念集会规模最大。

从1941年起,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陈果夫,宣传部长王世杰,副部长董显光,社会部长谷正纲等均曾参加过在重庆举行的记者节庆祝大会。(大公报,1941年9月1日)1943年,中国新闻学会在重庆举行记者节纪念会,国民政府社会部更是前所未有地主动提出“记者节日期,实应明予规定”,“令飭中国新闻学会将记者节定于九月一日之意义与经过情形呈报候核”。新闻学会“旋即据实呈复,并建议明定每年九月一日为记者节”。社会部“即与内政部洽商,会同呈请行政院核示”。1944年3月11日,行政院颁布“义一”字第5297号指令,正式确定九月一日为“国定记者节”。

至此,“九一”记者节第一次得到了官方承认,具备了合法身份。《大公报》不禁感叹,“这是有国定记者节的开始,自民国二十三年各地自省举行首届记者节,至民国三十三年举行国定记者节,历时恰为十年。”(大公报,1946年9月1

日)

抗战期间,“九一”记者节开始形成了固定的纪念仪式,通常包括报界、政界代表演讲,向殉难同业默哀致敬,以及会后的茶话与娱乐活动。如在1941年记者节纪念会上,萧同兹代表国民党政府,“历述中国新闻界在国民革命前后和中国抗战后之奋斗情况,并为数十年来被捕、坐监、殉难、遭炸之同辈默哀”。与此同时,上海孤岛报人也“致电蒋委员和前线将士表示敬意”,表示“坚守立场,努力岗位,已尽报人天责”。中午时分,上海报人面向重庆方向“静默三分钟,为淞沪抗战后殉难的同业沉痛默哀”。(大公报,1941年9月2日)而1944年,因是“九一”记者节第一次合法纪念活动,故其庆祝活动更为隆重。时任宣传部长的张道藩、程中行、马星野、董显光等国民党官员均列席纪念会;新闻界中胡政之、成舍我、王芸生等二百余人亦到会参加。萧同兹代表国民党发表讲话,“为新闻界对真理对世界对国家所作之努力奋斗表示慰问与敬佩”,同时提出四点要求:“一、希望新闻学会诸君从事学术上不断求进步,尤盼全国优秀分子大量涌入记者之群;二、希望记者在各自岗位上精益求精,提高报纸水准;三、希望记者养成健全舆论之风气;四、希望新闻学会会员及全国报纸数量,五年后十倍于今日”(大公报,1944年9月2日)。演讲后,全体代表向“抗战阵亡将士及殉难同业默哀致敬”。

白天的纪念会结束后,国民政府还会举办晚宴、放映电影等文娱活动,邀请新闻界代表参加。如1942年记者节期间,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为记者“播放联合国五彩新闻影片,尽欢而散”。(大公报,1942年9月2日)而1944年记者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慰劳记者,举行联谊晚会,受邀记者四百余人,几乎囊括了当时重庆报界的中坚力量。(大公报,1944年9月2日)

抗战时期,中国报人在记者节期间广泛开展社会公益活动,进一步树立了报界爱国、敬业的公众形象。报人郁达夫在1939年的记者节撰文指出,“我们做为中国的新闻记者有一条路,就是先要解放我们的民族,抢救我们的祖国”(郁达夫,1991a: 286)。在这种思想驱动下,他排演话剧宣传抗日。在义演布告中他写道,“溯自倭夷入寇,国社西迁,我中枢奋威以御强……念弟兄之飘泊东南,同是天涯,爰决于记者节九月一日,公演话剧以筹赈。乞侨贤共襄义举。推己饥己溺之心,尽为国为民之责。”(郁达夫,1991b: 270)抗战时期上海、长沙、香港、昆明等地报人均会在“九一”记者节期间,开展大型“义卖献金”,为抗战将士“寒衣捐款”,“捐助一日所得用以购买记者号飞机”(大公报,1939年9月2日)等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

记者节期间,爱国报人牺牲殉国的事迹,借助大众传媒被广泛报道。社会各界追思与缅怀报界先贤,构成了记者节另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为记者节营造了悲壮、凝重的氛围。郁达夫曾说,“我们在这一节日,首先自然得为我们的那些殉国的勇士们志哀,其次更不得不为我们的那些卫道的文化烈士们致敬。不论在平时或在战时,那些为社会正义而牺牲的热情记者们,才是我们的榜样,亦即是冥冥中在监视我们的英灵;纪念九一记者节而不思为国家社会献身,不思为正义人道殉职的人,这人就根本不是记者”(郁达夫,1991b:286)。夏衍则说,“遇到这个节日,压在心头的只是难堪的悼念而已。悼念那些在上海和敌伪短兵接战而殉难了的先烈,悼念那些在前线尽瘁于职责而伤亡了的同业,悼念那些在游击区在自己人的毒手下失踪和死亡了的友人”(夏衍,1941年9月1日)。抗战时期中国报人在各个战区坚持报道,付出了巨大牺牲,他们的事迹则借助记者节的宣传得以深入人心。1939年记者节,适逢上海《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被敌伪杀害。《大公报》、《中央日报》均以大量篇幅,详细报道报人英勇殉国的经过。《大公报》社论认为,“上海的朱惺公和暹罗华人报人”,他们“无国权保护而替国家奋斗,其艰苦忠贞是异常可佩的”(大公报,1939年9月1日b)。在弘扬爱国报人忠勇敬业精神的同时,各大报章还不忘揭露卖国报人的可耻行径,“表彰忠烈,严惩奸逆”,彰显了国家民族正气。

正如《申报》所言:“自全面抗战以来,记者活跃于每一道前线,每一处后方或敌后,工作的紧张,责任的繁重,使我们意识自己的节日,在团结,合作,进取等方面的重要性,因此一个伟大的节日,就一年一度的庆祝并广泛起来”(申报,1946年9月1日)。抗战爆发后,“九一”记者节的规模与影响不断提升,形成固定化的节日仪式和凝重的节日氛围,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和认可的专业节日。

(三)“九一”记者节的延续与反抗国民党新闻独裁政策

抗战时期,中国报人将新闻自由的职业理想让位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尚能对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给予容忍与克制。但到抗战胜利后,御侮的外界压力消失,新闻界重新回归到争取自身权益,捍卫言论自由的斗争之中。此间,适逢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起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并派代表团前往中国考察新闻自由状况。内外因素的叠加作用,借助记者节的活动迅速发酵,最终在1945年9月,演变成一场旨在废除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的“拒检运动”。

1945年8月重庆先后有《宪政》、《国讯》、《再生》、《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等16家杂志社,宣布于“九一”记者节当天不再将杂志送与国民党政府检

查。重庆《新华日报》继而发表《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有感》抨击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对于带着重重枷锁而奋斗过来的新闻界……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抗战中因为种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个七折八扣”，同时呼吁新闻界，“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新华日报，1945年9月1日）

这一运动引发了新闻界的强烈共鸣，此后中国新闻界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再次成为记者节的核心主题，并延续至全国解放，成为国统区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检讨既往，策励未来”：“九一”记者节与民国报人的职业自省

报人刘豁轩曾指出，民初的中国报人“只是具备些第二手新知识的士大夫，他们大多缺乏职业的兴趣与认识”，尽管此间中国报业发展“突飞猛进”，但随之而来的是“报人也因此比较多而且杂，三教九流，无奇不有，官僚政客落魄文人，以至于下野军阀，赌棍流氓都来办报”。（刘豁轩，1946）。在良莠不齐的报业环境中，民初报人缺少职业的自律与操守，当时的“新闻记者有老枪，有敲竹杠的流氓，有公索诈津贴的，有专门叨扰商家酒食的，有奔走后门以图一官半职的，种种丑态罄竹难书”（谢六逸，1931）。而记者节的出现，恰为民国报界改良积弊陋习，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抗战期间，在“反省”的基础上，报人大力弘扬职业道德，一个“爱国”、“负责”的报界新形象逐渐开始建构。

有感于近代中国报人在职业操守的缺失，记者节在设立之初，报人将职业的自我与反省视为构建职业新形象的路径。有论者指出，“今天纪念这一个节日，我们必须深切反省，我们必须痛下觉心，尽我们的力量来洗刷污点”（新闻记者，1939年9月1日）。《大公报》则在历年记者节中勇于展示自身的不足。《大公报》1939年记者节当日的社评即提出，“今天是九一记者节，在民族大战中，我们的报人逢这个节日，实有一场感奋与惭愧。报人所一向视若生命的是言论自由，但在今日这个问题，简直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现在我们奋全力拼生死争的是民族国家的自由……所以今天记者节我们第一应为尽力国家自由而感奋；第二为自己的尽力不够而惭愧”。（大公报，1939年9月1日b）而1942年的记者节《大公报》的评论进一步指出，“抗战第六年度记者节令，更能启发我们较为深邃的感想，痛切的反省”，“我们的人格操守是否如此严肃？我们的工作能力是否与之相称？我们的热忱与毅力一否足够充满？我们真应该惭愧忏悔是否还有立志不坚，努力不足的动摇

而懒惰的现象？是否有节操欠修行为不纯的情形？”。（大公报，1942年9月1日）

连续而急切的追问反映出抗战时期记者职业道德建设的急迫。甚至在抗战胜利时，这种职业反省意识依然是中国报人思考自身职业前途的基调。1945年的记者节，报人并未因抗战胜利而自喜，《大公报》的社论反而提出，“八年的艰苦抗战，我们的报人虽然流离播迁，始终拥护抗战大业，以迄胜利到来，但毕竟惭愧努力不够，尽职太少。单以后方的报界而论，以有限的人才，破烂的设备，居然对付到抗战到来真是侥幸”。（大公报，1945年9月1日）报人的职业反思意识，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记者节的言论内容中，中国报人从新闻精神到职业行为的各个层面剖析自身不足，在节日庆祝之外，敢于自曝家丑，心存对受众的敬畏，这是报业对民众与社会负责的态度。

职业反省目的是在揭露报界旧病陈疴的同时改造新闻界，树立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在“不破不立”路径下，报人职业反思与道德的重建同时展开。《大公报》指出，“我们庆祝同业共相勤勉，更要提高们的新闻道德，严肃我们的奋斗精神，为国家和人类忠勤服务”（大公报，1943年9月1日）。抗战时期，《大公报》将“厚自待，笃自修，不改业，不辍功”，视为自身职业道德追求的目标。而1948年记者节期间，《大众新闻》则推出《记者节记者谈心》的专题，邀请十余位知名报人探讨职业问题。有人指出“一个真正有志于新闻事业者应当像一朵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举世皆醉我独醒，如此时代如此社会一个有抱负的新闻斗士必须如此”（大众新闻，1948年9月1日）。有人则认为，“新闻记者可以出卖知识出卖健康，唯有新闻道德出卖不得”。记者群体坚信新闻界对不良道德有进行自我净化的能力。“这类事政府管不了，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来管，记者本身应该有自治的能力，各地记者公会应当负起责任来”（大众新闻，1948年9月1日）。“九一”记者节期间，对新闻职业道德与从业精神的讨论，使记者节成为新闻界一年一度的自我教育运动。借助报刊、广播报道，国人不但了解了报人自身道德改造的进步，更可参与其中，臧否报人的行为得失，用社会监督的方式，敦促报人恪守职业操守，实现“有良者即予改进，有可嘉者更加鼓励”的教育目的。（新闻杂志，1936年9月1日）

抗战胜利后的“九一”记者节，中国报人更试图以国际化的视野，在吸收域外新闻理论成果的基础之上，用新闻自由理论和社会责任论，对报人自身的职业形象做学理层面的探讨。借助“援西入中”的模式，为中国报人职业化建设寻找新的理论凭藉。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全国各大报刊在记者节期间出版了大量纪

念专辑、专刊和社论，它们从历史、现实和学理的层面向国人系统介绍西方新闻思想的渊源和理念，从而使40年代中后期的“九一”记者节活动呈现出浓厚的新闻学术色彩。

自40年代后期，有鉴于西方新闻自由所带来新闻失实，过度商业化的流弊，以《大公报》、《中央日报》为代表一批报纸着重在记者节期介绍和宣传西方新闻思想中的“社会责任理论”。1947年记者节期间，《大公报》刊文称，建立“自由而负责的报纸”，是未来中国报界发展的方向。该报认为，“自由而负责的报纸，在现代上进步的社会中，是支撑这个社会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大公报，1947年9月1日）。

中国报人职业地位的提高，有赖于其自身高度的责任感和对法律的尊重。“我们的记者节既由纪念政府尊重并保护记者的自由而起，我们自然也应该自尊自保自己的自由……政府与新闻界都要切实遵守，严格守法，必不可法外用权”。（大公报，1947年9月1日）《大公报》同时批评国民党如能，“认真博采舆论，虚怀接受批评，则行政效率自可提高，政治风气自可清明”。而压制报业言论，不但报纸“肃然无生气，其结果，固有害于国家，更无利于政府，一个经不起坦率批评的政府，必不能的人民的爱戴，其基础亦难臻于巩固，在成平时代如此，在动乱时代尤其如此。”（大公报，1947年9月1日）

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同时，《大公报》对于新闻界滥用话语权的提出了忠告。“倘有自由，须负责任。自由权利的形式须与责任相伴而后可，所以自由而不负责任的报纸在欧美早已为社会所诟病，斥为滥用自由，指为垄断公意”。至于何为报人追求的责任？《大公报》明确提出：“所谓负责，其要义为不专追利润，不热衷权势，不媚群众，不畏强御，应乎社会需要，真为大众而服务。简单诠释不外乎纪载真实，立论公平，无偏私无成见。能使一般公众，藉报纸的刊行，而知其所当知，言其所欲言”（大公报，1948年9月1日a）。

对于如何建立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纸”，《大公报》认为仍有赖于新闻界树立崇高的职业信念，同时进行道德的自我约束，“自由而负责的报纸之初先，其先决条件为新闻记者能认清使命，争自濯磨，且须有为众福利而奋斗的信仰”（大公报，1948年9月1日b）。显然，《大公报》的观点受到了同期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强烈影响，借助记者节的时机，《大公报》适时将其引入至国内，试图借以为中国新闻道德建设提供理论的支撑。

三、“九一”记者节与民国报人职业形象的嬗变

纵观清末民初的中国新闻业，尽管产业发展活力十足，但其个性品质和价值观念却远未形成。此间职业报人群体的规模迅速壮大，但随之而来的是报人群体作为一种新型职业，尚未形成整个行业所普遍遵循的职业道德与规范。那时“中国的报人在多数人的脑筋里以为新闻记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所以办报的人，常是无聊的政客报纸的企业，是政客官僚们刮地皮余剩下来的残肴”（谢六逸，1931）。制度建设的缺失，职业理想的淡漠，使得民初报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以至于“一般报人不齿于人寰”，国人视“报人无好人”，舆论对报界的批评和指责大有众口铄金之势（杜绍文，1939）。而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险恶的政治生态，进一步加剧了报人的职业风险，与其因言获罪不如明哲保身成为报人普遍的职业选择。《大公报》即认为：“今日报人论，时会甚艰，业务奇窘，职责特烦巨，心情极沉重，实在无暇多谈理想，且亦大半无此兴趣”（大公报，1948年9月1日a）。报人常自比为“陌路文人的化身”，行业风气的低下，败坏了整个报界的职业形象。

毫无疑问，“九一”记者节的设立及其纪念活动，借助言论和节日仪式，实际是民国报人群体职业道德净化的成功尝试。报人试图通过记者节构建一整套符号象征体系，年年此日的纪念活动固化成为一种稳定的历史记忆，在这一过程中新闻职业本身所需要的信仰、道德、精神传统得以重建并代代相传。民国报人曾言：“有了节，在过节这一天，当然是兴高采烈的举行纪念仪式，才能表示纪念庆祝”，（中央周刊，1946年9月1日）。以节日为载体，报人着力弘扬新闻理想，复兴职业传统。记者节借助纪念会，公益事项，缅怀报人事迹等仪式与活动，实际是，“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仪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连绵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吉尔兹，1973/1999：11）

九一记者节的创立是新闻的行业力量与国家政治力量共同创建的节日。在普通时间序列中插入报人享受的特殊日子，其功能是纠正过去国人对新闻职业群体的歧视或不公的记忆。加之媒体的强势宣传，使得国人在同一时间迅速形成了对新闻业的高度关注，进而认识到中国报人是“资格智能有其标准，执行业务有其规范”的专业化队伍。抗战后，九一记者节已经“不只是中国记者的节日”，“知识青年”和“一般民众”也会参与节日活动。（了了，1941年）自四十年代后，记者节的规模与影响已经超越了行业内部活动的范畴，成为由行业、民间和政府共同“操演”完成的全国性活动。

记者节开展活动的三四十年代，其规模与影响已逐年扩大。“几年前记者节对一般人颇有陌生之感，到今天已成为相当响亮的名词”（雨田，1941）。与记者节影响力同步提升的还有中国报人在国人心中的职业地位与形象。这一时期，污记者为“无聊文人之末路”（刘导生，1993：168）的谬论已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新闻记者在前日社会上，确已成了神圣而权威的头衔”（白丁，1934年9月1日）。记者陆诒直言，中国报界“为混饭吃而做记者，为办报而办报的时代早已过去”（陆诒，1945：51）。三四十年代，中国报人新闻职业理想已开始建立，“矢志忠诚，服务公众”的职业信条，逐渐成为行业的共识，职业风气大为改观。

“九一”记者节从民间呼吁记者自办的庆祝节日历经十余年的不懈争取与斗争，最终成为官民共同参与，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国定假日，显示了中国报人群体已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中间力量”。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社会的两极之间，客观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一中间地带社群渴望改变自身命运，改变自身地位，天然地成为他们关心国家政治前途的动力”（闻黎明，2004：1）。显然，具有自由身份的中国报人群体是中间社群的重要力量，他们以记者公会等团体为依托，利用报纸，为争取民众和自身权益而斗争。在记者节活动和仪式过程中，报人不断强调“报人与报人，报社与报社间，要有切实的合作与联系”，要建立“浓厚的共同意识”（报学杂志，1948年8月16日），其实质是为新兴职业社群凝聚力量，参与政治与社会活动。

“九一”记者节的创立与活动展示了中国报人日渐成熟的职业自信。敢于在国人面前暴露自身的不足，体现了真诚为民的从业态度，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将受众视为报纸生存的基础。《大公报》指出，“新闻事业之值得被尊重，值得纪念，并不是侥幸的事情，是由新闻的自尊、努力奋斗中得来的”（大公报，1942年9月1日）。抗战中，中国报人为民族存亡呼号，抗战后不畏艰险投身于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这些作为得到了民意认可。如《大公报》所言“就报人立场而言，真正的言论自由，实有赖于自己勤奋争取，大抵报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其本身就充满着斗争性，言论自由的切实保持，实有赖于报人反抗的勇气，稍存恇怯心理，自由立即消失，基于为社会人类的平凡愿望，无偏私，无成见，忠于良知，而勇于发表，这确是中国报人应有的基本信念”（大公报，1947年9月1日）。而确立这一基本信仰的动因是源于对报人对自身道德的自我约束，对新闻受众的尊重。《大公报》曾坦言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报纸的言论，记者是不会太出轨的，因为他们一要防范刑法吃官司，更怕得罪读者，报卖不出去，无论什么报都需要争取读者，谁的

言论太不公正了，读者就不看了”。（大公报，1948年9月1日a）提倡新闻精神与职业道德，实际是中国报人在市场面前所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

40年代报人曾分析中国新闻界缺乏力量的原因在于“一、政治上不上轨道，战时限制，报纸备受欺软怕硬的折磨；二、社会大都缺少尊重舆论听纳批评的雅量，甚至还可能对新闻记者以胁诱而侵敛其人格与心灵；三、新闻界自身的努力与奋斗都太不够。”（大公报，1944年9月1日）民国时期，尽管报人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故记者节对于中国报人境遇的提升作用是有限的。记者节期间，国民党的“礼遇”，多徒具短期和象征意义。解放前夕，全国打砸报馆风气盛极一时，天津《益世报》在记者节曾哀叹，“打记者，砸报馆，去年一年内，几乎到处皆有，且几乎全国成风……时至今日，似乎‘打’成为对付新闻事业、新闻记者一种速战速决的手段”（益世报，1947年9月1日），记者节期间看似举繁荣的活动背后，却是民国报人日益严峻和险恶的生存环境。

四、结语

全面考察“九一”记者节的创设与活动，笔者认为民国时期记者节不仅承担了反抗国民党政府言论控制，争取舆论自由的政治使命，更是报人群体塑造新闻传统，净化行业道德，提升职业形象的重要活动。记者节是中国报人职业化水平提升的产物，同时又进一步推动其向纵深发展。上世纪30—40年代恰为中国报业新旧转型的关键点，记者节为中国报人树立崭新的职业形象发挥了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事实上，新闻职业形象的建构，仰赖于从业者的道德操守，它一旦形成即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稳定性。正如李普曼所说“报人并非某些人发明，也不是任何人有意识的倡议下而产生的，它是在一个世代演进下，经过不断的尝试和错误，而慢慢形成的”（Roshco，1975；转引自黄旦，2005：346），中国报人群体通过记者节建构职业形象的努力，无疑为民众提供了用来衡量、评价新闻界的一把标尺。1948年《大公报》在概括记者节意义时曾指出“记者必须与社会大众歌哭相闻，呼吸相通，剔除优越感，提高责任心。基于服务人群的赤诚，加紧学习，接受批评。一面保持中国报人的优良传统；一面着眼于历史的新页和时代的潮流，乘我们的节日，做自我的检讨，鞭策自己，日新又新，这当不失为有意义的一件事”。（大公报，1948年9月1日b）今天重新回溯“九一”记者节的时代意义与精神传统，对我们思考当下中国新闻界的自身建设仍有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责任编辑：熊壮）

注释 [Notes]

1. 对“九一”记者节的研究文章目前主要有史述之的《关于九一记者节的历史》（《新闻大学》，1986年第4期），《九一记者节的始末》（《新闻记者》1984年），刘晓滇《江生日报事件与记者节》（《民国春秋》2005年第1期），赵建国《1930年代新闻界与政治国家之互动关系-以刘煜生案为例》（《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2期），这些论文以政治斗争视角分析该节日来历，但对记者节在近代中国新闻职业化建设中的作用却讨论极少，笔者试从此为切入点，以国统区记者节纪念活动为主要考察重点，揭示记者节对于中国新闻专业建设的意义。
2. 陈为镛在《中国记者节史话》一文中认为，记者节“它的首次明确提出是在1934年，而得到全国新闻界大多数同仁的真正承认则是在1935年”，（见《新闻知识》2000年第11期）。本文认为此说有误，因1934年全国新闻界已开始记者节纪念活动，说明其此时即已得到了新闻界的承认。

引用文献 [Reference]

白丁(1934).纪念记者节.《新闻通讯》,(17).

[Bai, Ding (1934). Commemorating the Journalists' Day. *Newsletter*, (17).]

报学杂志(1948年8月16日).迎记者节.《报学杂志》.

[Newspaper Magazine (Aug.16, 1948), Welcome to Journalists' . *Newspaper Magazine*.]

大公报(1939年9月1日a).大美晚报朱惺公遇难经过.《大公报》,3.

[Ta Kung Pao (Sep.1, 1939a). The process that Zhu Xingong from Da Mei Evening News was killed. *Ta Kung Pao*, 3.]

大公报(1939年9月1日b).祝记者节——报人自勉.《大公报》,2.

[Ta Kung Pao (Sept.1, 1939b). Celebrating the Journalists' Day--journalists spur themselves. *Ta Kung Pao*, 2.]

大公报(1939年9月2日).各地庆祝记者节.《大公报》,3.

[Ta Kung Pao (Sept.2, 1939). People in all around of china celebrate the Journalists' Day. *Ta Kung Pao*, 3.]

大公报(1941年9月1日).今日记者节 陪都新闻会举行纪念会，《大公报》，3.

[Ta Kung Pao (Sept.1, 1941). Today is the Journalists' Day; alternate capital press is holding anniversary events. *Ta Kung Pao*, 3.]

大公报(1941年9月2日).昨日记者节 沪新闻界电蒋委员长致敬.《大公报》，3.

[Ta Kung Pao (Sept.2, 1941). Yesterday was the Journalists' Day, the press in Shanghai sent telegrams saluted to Chair Chiang. *Ta Kung Pao*, 3.]

大公报(1942年9月1日).记者节的惕勉.《大公报》，2.

[Ta Kung Pao (Sep.1,1942). The Journalists' Day bring about incentives. *Ta Kung Pao*, 2.]

大公报(1942年9月2日).记者节陪都盛会 新闻学会举行首届年.《大公报》，3.

[Ta Kung Pao (Sep.2,1942). The press institute of provisional capital held the grand first annual

- meeting during the Journalists' Day. *Ta Kung Pao*, 3.]
- 大公报(1943年9月1日).我们的节日.《大公报》,2.
- [Ta Kung Pao (Sep.1, 1943). Our festival. *Ta Kung Pao*,2.]
- 大公报(1944年9月1日).祝记者节.《大公报》,2.
- [Ta Kung Pao (Sep.1, 1944). Best wishes to the Journalists' Day. *Ta Kung Pao*, 2.]
- 大公报(1944年9月2日).纪念记者节 陪都新闻界集会.《大公报》,3.
- [Ta Kung Pao (Sep.2, 1944). Commemorating the Journalists' Day, The press of provisional capital hold rallies. *Ta Kung Pao*, 3.]
- 大公报(1945年9月1日).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大公报》,2.
- [Ta Kung Pao (Sep.1, 1945). One thing the government can do first. *Ta Kung Pao*, 2.]
- 大公报(1946年9月1日).记者节之由来.《大公报》,5.
- [Ta Kung Pao (Sep.1, 1946). The origins of the Journalists' Day. *Ta Kung Pao*, 5.]
- 大公报(1947年9月1日).祝第四届记者节.《大公报》,2.
- [Ta Kung Pao (Sep.1, 1947). Celebrating the fourth Journalists' Day. *Ta Kung Pao*, 2.]
- 大公报(1948年9月1日a).今日记者的责任.《大公报》,3.
- [Ta Kung Pao (Sep.1, 1948a). Reporter's responsibility nowadays. *Ta Kung Pao*, 3.]
- 大公报(1948年9月1日b).九一之梦.《大公报》,2.
- [Ta Kung Pao (Sep.1, 1948b). The dream of Sept.1. *Ta Kung Pao*, 2.]
- 大众新闻(1948年9月1日).记者节记者谈心.《大众新闻》.
- [The Mass News (Sep.1, 1948). Journalists had a heart-to-heart talk on Journalists' Day. *The Mass News*.]
- 杜绍文(1939).《中国报人之路》.金华:浙江战时新闻学会.
- [Du, Shaowen (1939). *The Road of Chinese Journalists*. Jinhua: Wartime Press Institute of Zhejiang.]
- 黄旦(2005).《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Huang Dan (2005). *The Images of Communicat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克利福德·吉尔兹(1999).《文化的解释》(郭于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Geertz, G. (1999).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was published in 1973).]
- 了了(1941).纪念九一记者节.《中学生》,(47-48).
- [Liao, Liao (1941). Commemorating the Journalists' Day on September 1s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47-48).]
- 刘导生(1993).论记者的修养——为记者节而作.载《抗日烽火》.山东:齐鲁书社.
- [Liu, Daosheng (1993). On reporter's accomplishment: writing for the Journalists' Day. In *Flames of Anti-Japanese*, Shandong: Qilu Bookstore.]
- 刘豁轩(1946).《报学论丛》.天津:益世报社.

- [Liu, Huoxuan (1946). *Newspapers Remarks Set*. Tianjin: Yishi Daily.]
- 陆诒(1945).谈记者节.《中国建设》,(6).
- [Lu, Yi (1945). Talk about reporter festival. *China Construction*, (6).]
- 申报(1946年9月1日).记者节的诞生.《申报》,2.
- [Shun Pao (Sep.1, 1946). The birth of the Reporters' Festival. *Shun Pao*, 2.]
- 外部周刊(1935年9月10日).使领馆消息 驻槟榔屿领馆通讯(第廿六号):(三)檳城报界热烈庆祝记者节.《外部周刊》.
- [External Weekly (Sep.10, 1935).News from Penang Consulate(26th):The Press of Penang celebrated the Journalists' Day enthusiastically. *External Weekly*.]
- 闻黎明(2004).《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Wen, Liming (2004). *The Third Force and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Anti-Japan War*.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夏衍(1949年9月1日).悼念.《香港华商报.灯塔副刊》.
- [Xia, Yan (1941). Mourning. *Hua Shang Pao(Hong Kong)*, (Lighthouse).]
- 谢六逸(1931).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载黄天鹏(编)《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屋.
- [Xie, Liuyi (1931). The importanc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its facilities. In Huang, Tianpeng (ed.). *Journalism Lectures*. Shanghai: Modern Publishing House of Shanghai.]
- 新华日报(1945年9月1日).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新华日报》,2.
- [Xinhua Daily (Sep.1, 1945). The Struggle for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feelings on the Journalists' Day on September 1st. *Xinhua Daily*, 2.]
- 新闻记者(1939年9月1日).九一记者节告全国会友书.《新闻记者》,(2):3-5.
- [Journalists (Sep.1, 1939). A letter to national members on Journalists' Day of September 1. *Journalist*, (2):3-5.]
- 新闻杂志(1936年9月1日).从记者节说起.《新闻杂志》,12.
- [News Maganine (Sep.1, 1936). Talking about Journalists' Day. *News Maganine*, 12.]
- 益世报(1947年9月1日).纪念我们自己的节日.《益世报》,1.
- [Yi Shi Paper (Sep.1, 1947).Commemorating our own festival. *Yishi Daily*, 1.]
- 郁达夫(1991a).九一记者节演剧筹赈宣言.载《郁达夫文集第1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
- [Yu, Dafu.(1991a). Declaration of collection relief with dramas of Journalists' Day on September 1st. In *Yu Dafu Collection Vol.12*. Guangzhou: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 郁达夫(1991b).九一记者节.载《郁达夫文集第8卷》.广州:花城出版社.
- [Yu, Dafu (1991b). Journalists' Day on September 1st .In *Yu Dafu Collection Vol.8*. Guangzhou: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 雨田(1941).记者节的追忆.《新闻战线》,(5-6).
- [Yu, Tian (1941). Recalling of Journalists' Day. *News Front*, (5-6).]
- 中央周刊(1946年9月1日).通讯与评论.《中央周刊》,8(33):14-15.
- [Central Weekly (Sep.1, 1946). Communication and comment. *Central Weekly*, 8(33):14-15.]